

**跨文化议题****瘟疫和人类命运的思考**

赵士林\*

如果说 2003 年的非典，还只是瘟疫露一次脸，热一热身，那么 2020 年的新冠，就已经是瘟疫横冲直撞地正式登场了。迄今为止，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导致逾 2300 万人患病，逾 80 万人罹难（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同时，患病数字和死亡数字每天都在大幅提升）。

人们很可能列举历史上的大瘟疫，例如中国汉末的“伤寒”、明末的“鼠疫”，清后期的“鼠疫”，世界上欧洲十四世纪的“鼠疫”，美洲十六世纪的“天花”，二十世纪初的“西班牙大流感”，等等，这些大瘟疫均夺去了数千万甚至上亿人的生命。和这些大瘟疫相比，今次新冠疫情还是小巫见大巫。但要注意的是，且不谈新冠疫情还是进行时，结果如何还很难逆料；也不谈新冠疫情发生在人类已经战胜鼠疫、天花等凶猛流行病，高科技凯歌行进、人均寿命和生命质量都空前提高的时代，新冠疫情对人类不啻于提出了一个更严峻的新挑战，对乐观的“文明进步论”者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仅从社会心理的角度考察，如果说以往的瘟疫对我们来说只是历史，只是故事，只是数字，那么今天的瘟疫，则让我们身临其境，真切地感受到瘟疫是什么意思。以往瘟疫中的“他在”，变成了“此在”；“他们”变成了“我们”。我们喜欢谈论世界末日，其实大多数情况下是无关痛痒地谈论，是在谈论着一件和自己无关的事情，是在谈论着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但今次瘟疫，却让我们恐怖地看到世界末日的阴影。

或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痛切地思考，瘟疫对于人类命运究竟意味着什么？

有人说，瘟疫创造历史，决定人类命运。似乎不无道理。例如，公元前 429 年，就在民主的雅典和独裁的斯巴达决战、雅典即将获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时刻，雅典主帅、伟大的政治家伯利克里被瘟疫夺去了性命，雅典民主制从此衰落。以斯巴达为首的军事独裁联盟统治希腊，窒息了希腊的繁荣。

再如，公元 180 年，率领大军攻击北方蛮族日耳曼的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就在即将战胜日耳曼的时刻死于瘟疫，主帅病歿，大军只好班师回朝。留下日耳曼这个后患，竟然灭了罗马帝国。

还有，公元六世纪的东罗马帝国瘟疫，摧毁了查士丁尼皇帝的统一梦，此后东罗马帝国一蹶不振，终于被伊斯兰吞噬。公元十四世纪爆发于意大利迅即蔓延于整个欧洲的“黑死病”，动摇了教会的权威，为文艺复兴创造了前提。公元 1917 年的伤寒瘟疫夺走了俄国军队的战斗力，埋葬了沙俄帝国。等等，等等。

当然，对上述案例的“瘟疫决定论”的解释，已经遭到一些历史学家的质疑，但是瘟疫对于加速或延缓历史进程，特别是对于人类在特定时空中的特定命运，确乎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另一个维度看，所谓“祸不单行”，所有的瘟疫差不多都是天灾再加人祸，人类对瘟疫的伤害仿佛犹嫌不足，更给瘟疫加上种种人类特有的毒素，加倍残害自己。所谓“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修昔底德、薄伽丘、狄更斯、杰克·伦敦、加缪、笛福，……差不多所有伟大作家在记录瘟疫时都揭露了瘟疫中人性劣根性的膨胀，迷信、自私、残忍、贪婪和瘟疫联手加害人类。

新冠疫情以来，仿佛觉得此伏彼起的疫情对人类的伤害还不够惨烈，政客们热衷于借题发挥，甩锅大战；意识形态之争，社会制度之辩，乃至所有传统的国家矛盾、政治斗争都借疫情白热化。极权借瘟疫获得似乎更合乎情理的动力，因疫情而显得格外的全球合

\* 赵士林，（中国）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荣休教授。

作反而被去全球化削弱。世界第一大国和第二大国的关系陷入冰点，重要的诱因之一就是围绕冠状病毒产生的分歧和对立。

历史上，瘟疫与战争总是如影随形。今天，会爆发一场“冠状病毒战争”吗？

我想起了《圣经》预言的最后的审判。德国伟大画家丢勒的版画《启示录四天使》中所描绘的场景：在最后的日子里，执行最后审判的四位天使，瘟疫、战争、饥荒、死亡，同时降临。

## 二

姑且搁置人类自身劣根性的影响，仅从自然力的角度考察，完全有理由设想，也绝不是危言耸听，如果今次新冠病毒的毒性再高百倍，传染性再凶猛百倍，人类现有的防控措施均无效果，现有的科技水平束手无策，那么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人类的灭亡。

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角度，很难接受人类灭亡的预测。但是从宇宙的角度，从自然的角度的角度看呢，那就真如同苏东坡所说：“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人生天地间，不过就像水面上的一小飞虫，就像大海中的一粒小米呀！如此脆弱渺小的人类，若宇宙间之尘埃，生灭兴亡，简直就是悄无声息。从宇宙史的角度看，人类的诞生本是宇宙间十分偶然的小概率事件，是一个生物学“奇迹”，需要那么多的“恰到好处”，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的每一次“失衡”，都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如果条件具备，人类的灭亡，也是分分秒秒的事。

宏观世界的威胁，我们都十分熟悉。人类从诞生开始就经受着台风、地震、火山爆发的蹂躏，一次蹂躏就往往夺去一个部族的生命，夺去一座城市的文明。是的，人类试图通过科技进步摆脱宏观世界的威胁。例如我们已经能够通过海洋天气预报预防台风的灾害，但科技如此发达了，我们还是拿地震没办法。所有的大地震，都是大地一哆嗦，千万人瞬间就蒸发了。好吧，我们姑且乐观地预测，通过科学家的努力，再过几十年，人类终将能够准确地预测地震，从而大大减少地震造成的伤亡。但是，地震我们能够准确预测了，还有小行星撞地球哪！小行星撞地球的可怕在于我们能够准确预测却没有办法预防。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知道小行星哪年哪月哪时撞过来，但是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它撞过来。这岂不更可怕？地球总共有四十多亿年历史，其间已经经历了五次毁灭性的撞击。最近的一次发生在六千五百万年前，在那次撞击中，地球上连同恐龙在内的75%的生灵瞬间毁灭了。而据天文学家宣布，地球现在又正式进入了一个撞击周期。撞上地球就至少能够毁灭一个大城市的小行星，比我们肉眼看到的繁星还要多。天文学家们一天24小时紧张地盯着外太空。他们说了一句话：“我们只拥有一次机会。”这话绝不是危言耸听。只要一次我们对付不了，地球就玩儿完了。科学家在想尽办法对付小行星撞地球：用原子弹轰击，用太阳能辐射，……

我们姑且还乐观地预测，人类的科技终将战胜小行星，有效地预防小行星撞地球。但是小行星被战胜了，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宇宙还要毁灭哪！面对宇宙的毁灭，人类怎么办？科学又有什么办法？太阳终有一天不再升起，这是科学告诉我们的冷酷事实。太阳死了，人类还能活吗？当然，这个行程可能非常遥远，以至于有人要说我是杞人忧天。但是从宇宙的进程来看，这是总要发生的事。人类的命运注定是悲剧性的，科学的努力也注定是悲剧性的。

宏观世界的威胁是这样恐怖，微观世界的威胁甚至更加恐怖，那来无影去无踪的病毒、细菌、微生物制造的瘟疫都在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不知不觉间突然降临，令人类遭遇灭顶之灾。年初时，有谁能想到，新冠病毒会如此凶猛，肆虐整个地球？在高科技、医药学高度发达的今天，每天数十万人感染，每天数万人被夺去生命？更可怕的是，瘟疫造成的人间惨剧，不是让你痛快了断，而是让你在极端的折磨与痛苦中步入绝望，被拖向生命的终点。看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对雅典瘟疫的描述：“身强体健的人们突然被剧烈的高烧所袭击，眼睛发红仿佛喷射出火焰，喉咙或舌头开始充血并散发出不自然的恶臭，伴随呕吐和腹泻而来的是可怕的干渴，这时患病者的身体疼痛发炎并转成溃疡，无法入睡或忍受床榻的触碰，有些病人裸

着身体在街上游荡，寻找水喝直到倒地而死。甚至狗也死于此病，吃了躺得到处都是的人尸的乌鸦和大雕也死了，存活下来的人不是没了指头、脚趾、眼睛，就是丧失了记忆。”

在新冠病毒肆虐的城市，我们看到了类似的惨状。新冠病毒的罹难者，都是在极度痛苦的窒息中死去。种种人道灾难，在 21 世纪的文明世界，显得更加刺眼。

如果说地震、火山、小行星撞地球、宇宙毁灭对于人类的伤害还是偶发的，遥远的，可以预知的。那么瘟疫对人类的伤害却是随机的、不期而遇的、如影随形的。

### 三

面对瘟疫，面对生命的无常，宿命的悲剧，人类怎么办？古往今来，人类想了很多办法，来应对、来解脱灾难左右的悲剧命运。

解脱的方案林林总总，大致不外两种：世俗的与宗教的。

世俗的解脱方案可以宗教性不那么强烈的中国文化为代表。所谓世俗的方案，就是此生此世的方案，也就是人间世界的方案，用佛家的术语讲，就是此岸的方案。它又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审美境界，二是道德境界。

审美境界是人类亲和自然、融入宇宙的追求。古往今来，中国人用审美的眼光看宇宙，中国文化从来不把宇宙看成冷冰冰的物理空间；在中国人看来，宇宙是生命的鼓动，是情趣的流荡，是严整的秩序，是圆满的和谐。中国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宇宙观，对环绕着人类的大自然始终抱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感、亲和感、归宿感和家园感。所谓“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中国古人眼里的宇宙，是一个亲切的，充满了人情味的宇宙，是一个流动的，跳荡着韵律的宇宙，是一个动静统一，虚实相生的宇宙，是一个美的宇宙。把宇宙万物看成心心相印的朋友，把大自然看成生我养我的温暖多情的家园。

总之，人是在亲和自然、融入宇宙的所谓“天人合一”的审美情怀中，在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审美憧憬中，超越此生，克服畏惧，实现永恒。

你看苏东坡的追求：“须将幕席为天地，歌前起舞花前睡”，你看辛弃疾的情怀：“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李太白喝酒没伴儿了，还要约上空中的明月，再加上自己的影子：“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这是何等美妙多情世界？

在这样一个世界，你可以忘却宇宙的毁灭，忘却瘟疫的可怕。但审美的宇宙观局限于此生此世此岸，是一个世界的宇宙观，一个世界的宇宙观不能彻底解决人生的灾难，更不能战胜死亡的恐惧。因为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是要毁灭的。

道德境界是小我献身大我、个体投入群体的追求。从孔子的“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到胡适的小我投入大我的不朽观，都是在伦理诉求、道德境界中实现不朽。就是说，战胜生命的无常，实现不朽，不在神的怀抱里，不在天国，都是人间事。

肉体的不朽靠传宗接代，因此中国人特别重视血缘亲情，重视家族关系。强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说起来，中国人格外重视生男孩，和这个传宗接代都有关系。古代社会，只有男孩才列入排行，女孩是不能排行的。孔子在兄弟中排行第二，因此文化大革命中骂他是“孔老二”。他本来有九个同父异母的姐姐，但是都不算数。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尽管是残废，也算数。因此他的字叫“仲尼”。这当然是重男轻女，但是为什么有这个重男轻女？除了经济原因、政治原因之外，还有文化原因。对于中国人来说，他认为只有男孩才能传宗接代，女孩出嫁后就不是你家的了。这个看法说起来好像很荒唐，但是它却获得了现代科学的“证实”。现代遗传学已经破译了人体基因密码，也就是二十三对半染色体。生男孩和生女孩的奥秘被揭开了，在遗传学的层面上得到解释。原来，男性精子的染色体是 X 和 Y，女性卵子的染色体是 X 和 X。男性的 X 和女性的 X 结合，就生女孩。男性的 Y 和女性的 X 结合，就生男孩。这个 Y 非常重要。如果不发生基因突变，一个家族始终有男孩传下来，那么这个 Y 也就传下来。这个 Y 真的就是这个家族的不变的骨血。从这个意义上说，男孩传宗接

代的说法真的有道理。当然，讲这个道理不是让你去重男轻女。

肉体上的不朽靠传宗接代，精神上的不朽呢？那就是著名的“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显然，三不朽都是人间的事。中国人就是在这人间的一个世界中寻找人生意义，创造人生价值，实现人生不朽。

为了渲染这种不朽，儒家甚至将其上升到宇宙论的高度。“仁，天心也”，仁，就是宇宙的心。宇宙真的是大爱无边。于是，“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大人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在一种道德性的天人合一中实现永恒。

宋代大儒张载有名的“四句教”，概括了中国人的人生哲学：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sup>1</sup>

这个四句教，寄托着儒家的人生理想。

中国人就是这样，以一种实用的智慧执着人生，热爱人生。就像李泽厚师所说：四大非空，一切如实，宇宙皆有情，万物都盎然生意。何必玩世逍遥？何必诅咒不已？执着（体验）而又超脱它（领悟），不更好么？这就是生命的故园情意，同时也就是儒家的“立命”“生命多么美好，自然如此美妙，天地何等仁慈！那么，又何必去追求虚无，讲究寂灭，舍弃生命，颂扬苦痛，皈依上帝呢？就好好地活在世界上吧！”<sup>2</sup>

存，吾顺事，  
殁，吾宁也。<sup>3</sup>

张载的名言，道出了中国人的一个世界的生死观。

这种中国式的生死观乃至不朽追求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并不因为人生痛苦而否弃人生，它并不企盼人生之外的灵魂超度，它就在这个具体现实的人生——此生中培育一种道德化或超道德的灵魂——至真至善从而归于至乐的人格理想。另一方面，由于它所肯定、瞩望的道德灵魂、人格理想是一种纯然的此生的精神境界，仅靠这种此生的精神境界来忘怀、消弭人生痛苦，解脱死亡恐惧，实现不朽就不能不具有某种虚幻性甚至欺骗性。

因为，道德的精神境界作为此生此世此岸的诉求，同样不能超越一个世界的局限。不管有多少“其身殁焉，其道犹存，故谓之不朽”的议论，都不能摆脱一个世界的根本羁绊。“四句教”尽管极有气魄，但立足于天地间的万世，仍不出一个世界，仍没有超越历史，仍被范围于人类。以历史的群体的永恒来宽慰无济于事，因为历史群体也是要毁灭的。此外，这种道德论立足于圣人世界，非凡人所能企及，也就不能普遍地解决一个世界、一个历史、一个人生的根本忧惧。

#### 四

追求不朽、实现永恒其实是一个超越问题，超越死亡的恐惧、超越宿命的悲剧、超越人生一次性的问题。审美境界和道德境界都是此生此世的追求。无论亲和自然投入宇宙的审美追求，还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道德追求，由于不具两个世界的背景，都不是指向另一个世界的“外向性”的超越追求。但这不是说中国文化没有超越追求，在此生此世中，仍有一种所谓“内向性”的超越追求，李泽厚师、余英时教授等析之甚详。

在某种审美境界和道德境界合一的追求中，形成了中国人的超越感。我曾经在一篇讨论

<sup>1</sup> 《张子全集·近思录》

<sup>2</sup> 李泽厚：《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17页。

<sup>3</sup> 张载：《西铭》

王国维的文章中从中国人的人生态度入手阐释过这个问题。

中国人的人生态度，聚焦于两大问题。一是执着此生，一是选择此生。

如果说执著此生还只是肯定人必须活着，那么选择此生则提出：人应怎样活着？在这个问题上，固然可见出传统文化不同形态的不同观念，如道家更重自然生命，儒家更重伦理生命，但就最根本的价值取向来说，无论儒道都追求一种现世人生中超越的精神价值，而不是留驻于现世人生中的自然感性层面。它们并不宗教式地否弃人的自然感性欲求，但它们经常强调的是“节欲”，是欲的满足的合理化，并且就是在这种强调中，淡化欲、突出理。在欲和理的关系中，欲永远处于被支配、被规范的从属地位。可以为理牺牲欲，却决不能为欲牺牲理。欲虽然没有被简单地否弃，但它却永远也不会是人的本体存在，永远也不会是人生目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欲的存在正是为了被超越，为了走向理，在所谓即自然而超自然、即感性而超感性的此生的生命活动中，重心却是放在“超”上。因此，一方面是对感性生命活动的充分关注，这毕竟是超越的起点、超越的前提，它决定了中国人的多情；另一方面，就在这感性生命活动中追求一种抽象永恒的精神价值、精神境界（“道”），它决定了中国人多情但却从情到理，而非从情到欲。

肯定此生的感性生命又要从中寻求超越，这便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最终导向一种人格理想，对这种人格理想的坚定信念和不渝追求，使得中国人摒绝了神秘主义、纵欲主义、宗教迷狂等悲观的非理性维度的人生态度，而是始终对人生采取了一种乐观的理性主义态度。这种乐观的理性主义态度在面对现实苦难人生痛苦时表现得尤为鲜明。

为了深入认识中国人面对人生痛苦的乐观的理性主义态度，不妨以西方人对人生痛苦的理解作一比照。西方文化对人生痛苦作出最深刻的表述与论析的莫过于叔本华哲学。我们知道，叔本华所理解的人生痛苦具有本体论性质——世界的本体存在是生命意志，生命意志的本质就是痛苦，因此他说：“人从来就是痛苦的，由于他的本质就是落在痛苦的手心里的。”

中国人对人生痛苦的理解却与此大异其趣。他们并不认为痛苦是人生历来如此、永远如此的必然本质。他们并不把人生痛苦归结为人的本体存在，而是归结为“人心不古”（这个“古”在儒家看来是尧舜时代，在道家看来是更早的原始时代）。因此，面对人生痛苦，两者态度迥然相异。从叔本华对人生痛苦的理解出发，必然走向灭绝生命意志的彻底的悲观主义；从中国人对人生痛苦的理解出发，则可以走向某种社会理想、归根结底又是人格理想的追求。这种人格理想是至人、真人、神人（道家），是志士、仁人、圣贤（儒家），他们归根结底又是所谓“道”的体现、化身、象征。因此，“君子忧道不忧贫”“仁者不忧”“朝闻道，夕死可矣”“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如果能够得“道”，即便“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儒家）；如果能够得“道”，甚至“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风振海而不能惊”（道家）。在这样的人生境界中，任何痛苦当然都已荡然无存。

尽管儒道二家对“道”的理解很不相同，但它们都无限向往地追求一个“道”，而不像叔本华那样充满痛苦地灭绝一个“道”（生命意志）；它们都把“道”这个宇宙本体作为人生的神圣依据，而不像叔本华那样把“生命意志”这个宇宙本体作为人生的痛苦之源；它们都是在对人生的肯定中解脱人生痛苦，而不像叔本华那样在对人生的否定中解脱人生痛苦。儒家的“自强不息”“乐天知命”自不待说，就是在道家激烈批判否定社会现实的愤世嫉俗中，也处处流露出对理想人生的执著、憧憬。请看庄子那“死”的美丽颂歌——“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纵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这与其说是提倡一种宗教式的死的寂灭解脱，还不如说是高扬一种审美式的人生自由境界，在痛苦的人生中追求着一种理想的人生，走向一种既现实又超现实的审美超越。这种审美超越不是叔本华式的暂时安慰，而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人生目的。因此，中国人的人生态度归根结底是一种

相信人生有望的乐观主义。

总之，我们讲中国文化性格关注一个世界、一个人生，不是说中国人没有超越的追求，不是说中国人没有价值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区别，但中国人的超越追求也紧扣这个现实世界，这和西方文化就大不一样，恰如余英时先生指出的：“西方哲学上本体界与现象界之分，宗教上天国与人间之分，社会思想上乌托邦与现实之分，在中国传统中虽然也可以找得到踪迹，但毕竟不占主导地位。中国的两个世界则是互相交涉，离中有合，合中有离的。而离或合的程度则又视个人而异。我们如果用‘道’来代表理想的世界，把人伦日用来代表现实的人间世界，那么‘道’即在‘人伦日用’之中，人伦日用也不能须臾离‘道’的。”

但是，如前所述，以世俗的审美方案和道德方案或二者合一的精神境界建诸于终将毁灭的此世此生此岸，用这种精神境界来摆脱人生悲剧命运，归根结底是一种暂时的虚幻的慰安，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古往今来，中文世界充满了人生苦短的悲叹。“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

## 五

宗教的方案可以有基督教的、伊斯兰教的、佛教的……尽管多种多样，但都以两个世界的宇宙观为基石。如果你是虔诚的宗教徒，就能摆脱死亡的恐惧。因为在宗教徒看来，这个世界本来是暂时的、虚幻的、充满缺陷的。另一个世界，也就是神的世界，才是永恒的、真实的、完美的。蒂利希讲宗教是一种“终极眷注”。人类无论个体还是群体的终极问题就是死亡问题。终极眷注其实就是对生死问题的眷注，对超越死亡实现不朽的向往（当然，蒂利希自己的诠释并非如此）。这种眷注、这种向往只能寄托于另一个世界，神的世界。在对另一个世界的向往中，在神的眷顾中，就能超越人生的一次性、有限性，进入永恒，实现不朽，从而战胜人生的悲剧命运。

“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一心不乱……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

“惟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信道而且行善者，将蒙主的允许而进入那下临诸河的乐园，并永居其中”。

对神的信仰，不仅是此岸的代代相传，而且是彼岸的无穷延续。因此，他可以超越短暂的此生，实现不朽的永生。

在神的光芒中，所有的瘟疫、所有的灾难都化为乌有。神是超宇宙的，因此宇宙可以毁灭，人却可以永生。

有人会说，你说中国人内向性的超越追求、此生此世的审美境界和道德境界乃至二者合一的境界是虚幻的，宗教的许诺又何尝不是虚幻的呢？

问题还是在于超越的追求、永恒的安顿指向此岸还是彼岸。如果是此生此世此岸，一个世界一个宇宙，当我们确知这个宇宙是要毁灭时，那么建诸于这个宇宙的一切追求、超越、信仰都会化为乌有。如果是彼生彼世彼岸，另一个世界，那么神的永恒就保证了人的永恒。

有人或许会问，中国传统也不是没有宗教啊！为什么中国的宗教不能承担你所谓宗教解脱的使命呢？

中国有没有宗教呢？中国当然有宗教。我们自己有土生土长的道教，并且外面来了什么宗教我们都可以接受。但是中国人尽管对宗教十分包容，他对宗教的态度却是人间的、实用的，或者说功利的。例如中国唯一的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就是一种追求长生不死的宗教，它的得道成仙，它的神仙世界，并不在另外一个天国，它就是能够永远常驻的理想化的人间世界。这在世界宗教史上是独一无二的。适如李泽厚师所指出：“中国的实用理性使人们较少去空想地追求精神的‘天国’；从幻想成仙到求神拜佛，都只是为了现实地保持或追求世界的幸福和快乐。人们经常感慨的倒是‘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他生未卜此生休’、‘又只恐流年暗中偷换’……；总之非常执著于此生此世的现实人生。”

这种宗教态度有两重性。正面的效应是，我们没有宗教发达国家常有的那种宗教迷狂，宗教极端主义所带来的各种问题。梁漱溟先生就曾指出中国人的善于调适的“非宗教文化心态”“好讲情理的民风”是和合人际的重要文化润滑剂，而本来是为了团结凝聚群体的宗教却往往造成社会的人群分裂，如基督教世界的诸多宗派，如最重宗教的印度的社会分裂。

我们中国人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怎么为了宗教信仰还能发动战争？就像西方人也无论如何不能理解：我们一个人怎么还能信好几个神？

宗教心态实用化的负面效应是，由于缺乏虔诚强烈执着纯净的宗教信仰，我们往往就缺乏对神圣事物的敬畏心和庄严感，缺乏只有宗教才能带来的文化深度。

面对种种指向宗教的质疑，应该提醒的是，天国遵循的不是我们这个宇宙的逻辑，因此用这个宇宙的思维去寻找天国，注定落空。爱因斯坦不信上帝，霍金也摧毁了在宇宙中寻找上帝的努力。但上帝之城不靠这个宇宙的思维来定位。彼岸的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不是此岸的娑婆世界。还是要回到康德。当你用理性来思考神，追寻神的世界，你一开始就已经南辕北辙。今天很多宗教宣讲竭力用量子力学来论证神的世界的存在，其实是自蹈陷阱。神的世界是“不可知”的，是不能用理性通过科学思考来探求的。或许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他的真实性、无可怀疑性。

## 六

以强烈宗教信仰为精神传统的西方社会，当然也有对俗世生命短暂、人生一次性的感慨。

古希腊有个耐人寻味的神话：太阳神阿波罗和牧羊人伊达斯都看中了少女玛尔珀萨。两力争得不可开交，就来到众神之王朱庇特面前，请他裁决。朱庇特说：“还是让这位少女自己来选择吧！”少女选择了谁？她没有选择英俊的太阳神阿波罗，而是选择了放羊的凡人伊达斯。她为什么这样选择？请听她的理由：阿波罗是神，神是超越时间的，不死的，他会永远这样年轻，而我呢，总有一天会变成个老太太。那时候还怎样和他在一起？我不如嫁个凡人，和他一起慢慢变老吧！

不朽属于神，人注定要走向衰老，走向死亡。

因此大文豪歌德感慨：“岁月给我们送来了昨天、今天和明天，但有一天他不送了，他给我们带走了昨天、今天和明天。”

尽管也有不尽的忧伤和感慨，但是死亡问题对于虔诚的宗教徒是一个多少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前面说过，他将在另外一个超越的世界，在天国获得永生。任何宗教的重要功能都是解决死亡问题，也就是所谓的“终极眷注”，对人生最后一个问题的眷注。人生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死亡。宗教通过天国的设定，解除信徒的死亡恐惧，让他们相信死后有一个美好的永恒的世界等待着他，信上帝，就意味着不朽。

当然，尼采喊出“上帝死了”，标志着西方世界的宗教建构已经受到根本质疑和强烈颠覆。现代世界的世俗化，导致心理医生代替牧师。尽管去教堂行礼如仪，但虔诚性已可怀疑。种种神学适应世俗世界的努力（解放神学、自由神学等等），其实都是宗教向世俗投降。

但是，在世俗世界的家园里，人生一次性的阴影毕竟挥之不去。被这种阴影笼罩的人生毕竟充满惶惑。俗世的生存必然质疑俗世，而超越生存指向世俗之外。

蒂利希在他的《存在的勇气》中说：“当海德格尔谈到人对自己死亡的预见时，他关心的不是生命不朽，而是这种预见对人的处境意味着什么。当克尔凯郭尔讨论罪过问题时，感动着他的并不是罪过和宽恕的神学问题，而是在考虑到个人罪过的情况下人的生存有这种可能性的问题”

然而，生存论的讨论也必然指向生存的归宿。生命的尽头，生存意味着什么？宿命的虚无？无尽的深渊？“杳杳即长暮”？如果不想陷入绝望，还是要超越此生，瞩望永生。因此，

克尔凯郭尔还是走向神学，走向上帝。

他说：哲学的起点是人，终点是上帝，将人生的道路称为“天路的历程”。这个历程从感性存在、理性存在到宗教存在——一种祈祷和爱的生活，是对神的自觉和崇敬，从而使精神有所寄托的存在。

天路是此生的终点，是永生的起点。

宗教的回归，是宗教心理学，宗教社会学，宗教哲学，但必须落实到宗教体验，落实到宗教信仰的虔诚。同时要远离迷狂、偏执、巫术、愚昧。

落实到宗教体验，关键在于要有虔诚的宗教情怀，就是说，要真的信，毫不怀疑地信。基督教讲生命的三大支柱：信、望、爱，头一条就是信。只有在对神的信仰中，将人交付给神，人类的命运才能超越其悲剧性，投身神圣，进入永恒。

由于只有神的国才能令人类从根本上摆脱悲剧命运，因此强烈批判教会腐败，沉重打击了宗教信仰的伏尔泰都说：即使没有上帝，也要创造一个上帝。

2020年9月2日于加拿大温哥华